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4 冊

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上）

陳宏銘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上)／陳宏銘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序 20+ 目 6+192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輯；第 14 冊)

ISBN-13：978-986-6831-24-9(全套：精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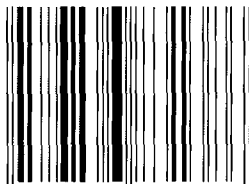
ISBN-13：978-986-6831-38-6(精裝)

1. 詞論 2. 道教文學 3. 金代文學 4. 元代

820.93056

96016215

ISBN - 978-986-6831-38-6



9 789866 831386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輯 第十四冊

ISBN：978-986-6831-38-6

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上)

作 者 陳宏銘

主 編 龔鵬程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 年 9 月

定 價 第二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作者簡介

陳宏銘，台中縣梧棲鎮人，1958 年 1 月生。現任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財團法人古典詩文教基金會董事。著有：《張孝祥詞研究》、《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將軍的手杖》（短篇小說集）、其他單篇小說、散文、詩、論文……等百餘篇，曾獲耕莘文學獎小說組首獎、高雄師大中國文學獎小說、散文、現代詩等三十餘次獎項、國際性彩虹青年文藝獎散文佳作、全國大專青年詩人獎、行政院國科會乙種學術著作獎、國科會甲種學術著作獎。

提 要

本論文研究對象為金元時期全真教道士的詞作，現存金元道士詞、作者可確認為全真道士者有 27 人，作品有 2723 首。

本論文研究動機，主要想了解金元全真道士詞在詞曲發展過程中，有無具體影響；並希望透過深入的分析，較清楚而全面地呈現金元全真道士詞作的特色與價值。

本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範圍、方法、內容大綱。第二章綜覈各專家學者之研究成果，對全真教興起的時代背景作一敘述，然後，就全真教在金元時期的開創與發展及全真的主要教義與儀規，作一概略介紹，藉以了解金元全真道士詞的寫作背景，以便正確掌握其內涵及風格形成的原因。第三章介紹王重陽的著作、探析王重陽詞作的內容及形式上的特色。第四章從生平事略、詞作內容分析、詞作形式分析三方面，分別介紹並剖析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等人的生平及其詞作。第五章分別分析王丹桂、長筌子、尹志平、姬翼、李道純、高道寬、宋德方、王志謹、苗善時、馮尊師、三于真人、劉鐵冠、牛真人、楊真人、范真人、紙舟先生、雲陽子、牧常晁、王玠等人詞作。第六章論述金元全真道士詞在內容與形式方面的特色，並指出其價值，主要有四：一、可作為考查全真教的輔助資料。二、可據以修補《詞律》與《詞譜》。三、可藉以研究宋詞與元曲的關係。四、提供了雜劇與小說的寫作材料。第七章綜合敘述本論文的研究心得及意猶未盡之處，一則自我檢視，一則作為未來研究的方針。

王 序

王忠林

陳宏銘博士，讀大學時即對文學興趣盎然，並常寫作，有文集刊行。進入研究所後，專研詞學，從余撰寫碩士論文，撰成《張孝祥詞研究》，鑑賞評析，甚為深入，而又能有其見地。進入博士班後，仍以詞學為研究主要方向，其詞學基礎既已穩固，對詞之發展流變、詞之體制、格律，以及表達技巧，均能了然。進而選擇論文題目，即思尋求前人較少涉入之範圍。蓋詞之初起，多出於伶工歌伎以及民間俗曲小調，其內容多為閨情怨思；及至蘇辛，詞情漸為擴大，家國社會無所不寫；後至金元之際，全真派道士各擅詞作，竟以詞作為宣揚教義啓迪人心之用，其對詞情之擴大，更進一程。而此境地，研究詞學之士，較少涉入。宏銘與余商議，欲於此中尋求論文題目，余亦以為頗有研究空間，於是決定題目為《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宏銘搜尋資料，由古至今，遍及內外，除詞學著作外，更包括道藏經典以及道教史料論著，研讀分析，頗費時日，論評立說，更需功力，用四年之功，終於完成此作。

本書經由深入分析，將全真道士詞之內容與形式上之特色，作具體而詳明之勾勒，至於全真道士詞之成就與價值，亦歸結舉出。文中不但作者能抒其己見，更能救正前人之誤失。尤其能根據各家作品，歸納比對，修訂增補詞律及詞譜，對詞學有其一定之貢獻。全真道士

詞，於詞中雖屬別派，但深具特色，對此派作品作全面深入之研究，亦可補詞史以及文學史之缺漏。書中又以宋詞、元曲與道士詞作比較，由曲調、造語、用韻、俳體、襯字以及內容與表現手法等，指出其同異，探求其淵源與影響。同時又以道士詞與雜劇中之道士劇、小說中之仙道故事作比較，考查其題材之關聯，以及思想觀念之因襲變遷，均有其特色與創見。

綜觀此書，對詞學發展史、詞之體制、詞律、詞調等，均能提供一些貢獻。另外，對道教之歷史、道教教義、全真教派之興衰承傳，以及其修練方式等，亦可作為研究取資。宏銘既勤力用功，著成此書，當不致空無所獲，希有識之士，加以鑑衡。此書即將出版問世，贅言數語，以為之序。

王忠林寫於高雄寓所

應 序

應裕康

陳君宏銘，將其博士論文《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整理修訂，印行問世。在出版前夕，希望我在卷首寫幾句話。宏銘是同學友王忠林兄的及門弟子，他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都是忠林兄所指導的，因此由忠林兄來寫序，是最名正言順的。但是宏銘也非要我寫幾句不可。假如爲了應付，我草草寫個幾百個字，大概也可以勉強報命了，但我卻寫了篇一萬多字的長序。主要的原因，是基於下列三點：

第一，現在的學術風氣，與以前有點不同，一些專家學者，年輕氣盛，將其學位論文，出版發表的，常不提這是他的學位論文，當然也不必提指導教授是誰？更不必說是請指導教授，寫幾句勉勵或批評的話了。宏銘則不然，因此我雖年老體弱，還願意跟宏銘絮絮叨叨，對談一番，可說是他一番尊師重道的古義，感動了我。

第二，宏銘在大學畢業後，曾在中學任教，後來又回系裡當助教，偏愛文學，當時系中的一切學生文藝活動，差不多都由宏銘企劃、實施。考研究所碩士班時，考了兩次才考取。第一次沒有錄取的原因，是「小學」這門課程的成績太差。語言文字之學，與宏銘研究的興趣不合，加上系中助教的事務太繁雜，也沒有充分準備的時間，考不好也是極自然的事。當時我擔任所務行政，對於一個好學生，不能錄取入學，還有些不能釋懷。但宏銘在落第之後，卻非常坦然，並且自己

檢討，「小學」既是治學的基礎，若學不好，勉強入學，也沒有意義。果然，經過了一年的苦學，準備，第二年就名列前茅，順利地考取了研究所。

很多在大學中成績很優異的學生，考研究所時偶受挫折，便往往不能振作，或自怨自艾，認為自己終究不是讀書的材料，再也不敢踏入考場；或者怨天尤人，責怪老師題目出得不好，分數打得不公，甚至覺得生不逢時，仿效一些遁世的古人，自我放逐，沒有再奮鬥的勇氣。宏銘這種勇於檢討自己，而又肯自立自強的勇氣，也令我對他刮目相看。

第三，我是宏銘博士論文口試的口試委員，在口試前，我詳細讀過他的論文。在口試時，也還好幾個有關的問題跟宏銘討論過。這些問題中，有些是宏銘談到的，而我卻有一點點另外的看法，有些是宏銘的論文所不能包含，而我卻覺得大有研究價值的。這次利用替他寫序的機會，一股腦兒都提了出來。加上這次寫序，我又細細地讀了一次他的論文，讀了也有些心得，也一起發表在序中。教學相長，即使是學生的論文，讀了照樣有長進我們做老師的學問的地方。

總之，這些村老野叟之言，不見得能登大雅之堂，就希望宏銘能包容見諒了。

※ ※ ※ ※ ※

道教是我國本土性的一個宗教，所以自成立以後，發展得非常迅速。尤其唐代，宗室李姓，正好又跟道教崇奉的教祖老子李耳，攀上了關係，因此道教的興盛，足可與佛教相抗衡。

唐代經太宗的貞觀之治，一直到盛唐，國力強盛，民生富庶。整個社會，在享受富強之餘，不免熱切希望長生不死，以圖永享幸福歡樂。在此背景下，道教的發展，為迎合時代的需求，便趨向齋醮、符咒、煉丹、服藥等方向，其目的只有一個，便是為人們消災祈福，長生不老，最好能夠立地成仙，永享逍遙幸福。此種虛妄迷信的發展，

至北宋末年而未止。尤其徽宗崇道，神化自己，迷信道法可以抵抗金兵，結果國亡被俘，爲天下笑。而此種慘痛的經歷，自然也引起知識分子與廣大的老百姓的反省，因而激發了傳統道教的改革的需求。

南宋時，道教除了傳統的正一道以外，另有三個教派，相繼成立：

太一教，由道士蕭抱珍創立，時在 1138 年（金熙宗天眷元年或南宋高宗紹興八年）。

真大道教，由道士劉德仁創立，時在 1142 年（金熙宗皇統二年或南宋高宗紹興十二年）。

全真教，由儒士王重陽創立，時在 1167 年（金世宗大定七年或南宋孝宗乾道三年）。

這三個教派有幾個相同點：

一、這三個教派，都創立於北方，也就是當時金人所統治的區域。至於時間，都在西元一一二七年汴京淪陷，徽、欽二帝被俘之後。華北地區的人民，在金人的鐵蹄之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這三個教派的創始人都是漢人。漢人在亡國的苦難之下，或則組織義軍，奮起抗金；或則遁入空門，藉宗教之力，解脫心中的鬱悶，尋求心靈之解脫，就變成極爲自然的事。

二、這三個教派都主張三教合一，特別重視儒家的思想，把儒家的書籍視爲經典。本來宗教的思想大多是出世的，與儒家的入世思想似乎不合。此三教派既主張三教合一，可見他們的真正精神是入世的，他們的目的，在於兼善天下，只是在窮困之時，佯狂遁世，獨善其身而已。選擇宗教，可以說是當時一張很好的護身符。

三、這三個教派的道士，都以清修爲主，一如佛教的僧侶，一律出家，與當時傳統的道教，不用出家，父子相傳，有根本上的不同。因爲一旦在宗教上造成父子相傳，就不免有私心的存在。當時傳統道教的墮落，與此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虞集曾說：

昔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道園

學古錄·非非子幽室志》)

不過這三派也有一個基本的不同，即是太一、真大道這兩派的始創者，本身都是道士，出身於當時的平民階級。而全真道的創教始祖王重陽，卻是出身當時的富庶人家，自幼飽讀詩書，並繫籍於金代的京兆府學，曾應偽齊劉豫的文科考試，所以王重陽是當時一個標準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儒士。所以個人認為太一、真大道的三教合一，乃是以道親儒；而全真道的主張三教合一，乃是以儒入道。因此我對全真教的看法，也可認為是儒家的宗教化。

※ ※ ※ ※ ※

大陸學者研究全真道，大約興起於九十年代。因為馬克斯主義是無神論者，在意識形態的包袱下，對於道教，自然只認為是一種消極的迷信信仰，沒有好感，也不加重視。然而在世界各國學者都開始重視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本土性宗教的壓力下，大陸對於道教（包括全真道）的研究就興盛起來。

我檢視大陸學者研究全真道的著作，因受制於意識型態，而對全真道有貶詞的，大約基於下列三點：

一、反宗教的意識，認為宗教是消極的、虛無的、荒誕的、利己的、個人主義的。這些看法，都抹煞了全真道利世濟民的慈悲思想。王重陽有一首〈轉調醜奴兒〉（見《重陽全真集》卷七）：

苦苦勸愚人，被財色，投損精神。利鞭名鎖休貪戀，韶華迅速如流箭，不可因循。

早早出迷津，樂清閑，養就天真。性圓丹結，方知道，蓬萊異境。元來此處，別有長春。

宗教家以慈悲心腸，勸人為善，勿為名利所鎖，這一種思想實際上是積極的，也是入世的。全真道主張真功真行，個人修行，必須功行兩全，方始圓滿。所謂「真功」，指的就是探求自己本性的修為，必須以「清靜無為」為主，這就是「獨善其身」。所謂「真行」，指的是弘道濟世，舍己利人，這就是「兼善天下」。以此來看，全真道實是積

極入世的。

二、全真道的創教始祖王重陽，與其主要的七大弟子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等，都是能文善詞，屬於當時知識分子的階層，而且如王、馬等，都是出身於富豪之家，財雄鄉里。在馬克斯主義以無產為美的意識形態桎梏下，這些不免成為王、馬等人的原罪。其實王重陽生於北宋徽宗政和二（1112）年的陝西咸陽，本是大宋人氏，但當他七歲之時，金兵破陝入關，便終生在金人統治之下渡過，戰亂加上亡國，其生活的痛苦可想而知。孫克寬氏〈金元全真教創教述略〉一文有云：

女真入主中原，殺戮淒慘，見於《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之所記，此不贅述。野史如《靖康紀聞》備載金人入城劫掠搜括之慘，京城如此，大河南北地方所遭遇之慘酷也可想而知。世族士大夫都向南方逃難，留下來的遺民孤子，便只有向山林棲遁，逃向佛老方面來託庇身心了。全真、太一兩教興起時，都能使民庶趨之若狂，正是這種關係。

對於金人鐵蹄下宋人所過的水火一般的生活，有很清楚的描寫。所以要了解全真道創教教祖王重陽的生活背景，亡國遺民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

錢穆先在在〈金元統治下之新道教〉一文中說：

全真初創，由於遺民忠憤，佯狂避世。及其全盛，則轉為教主慈悲，圓宏救度。此自別有一段精誠貫徹，所為與往日黃冠羽士神仙方伎者流異趣，而彼輩之所以仍必託於黃冠羽士間者厥因亦在此。

所謂「別有一段精誠貫徹」，正說明了全真道創教者的儒家精神。他們有這種精神，則與他們出身的家庭，造就了他們的知識分子階層，有密切的關係。若受「無產為美」的意識型態所梏，就很難深刻地了解他們出身的背景了。

三、全真道創於金而盛於元，盛行的契機在於當時的掌教人丘處

機，應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召，萬里西行，親爲太祖講道，深得太祖之心，東還之時，賜號神仙，掌管天下道門大小事務。自此全真道得元庭之助，如虎添翼，日益開展。全真道在元盛行之背景如此，大陸的學者自不免以民族的大義來責備全真道，以爲他們助元而不助宋，實是民族的罪人。

實際上丘處機應元太祖之請，主要是認爲南宋苟安，不知圖強，不但不能北定中原，而且遲早亡國。至於金乃異族，長期壓迫漢人，作威作福，且盛極而衰，不免滅亡。在權衡輕重之餘，以天下蒼生爲念，能夠說動元太祖，以全黎民，才是真正值得做的事。且看丘氏應元太祖之聘西行時，年已七十四（元太祖十六年，西元一二二一年），風燭殘年，風塵僕僕，豈是爲自己的富貴榮華？所以當爲元太祖講長生之道時，丘氏都以「不嗜殺人」及「敬天愛民」爲說，可見其存心之如日月了。

元太祖十六年正月，丘氏曾寄詩燕京道友言志：

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

去歲幸蒙慈詔下，今年須合冒寒遊。

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

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

對天下蒼生黎民之關懷，溢於言辭。而實際上丘氏得見成吉思汗後，全真盛行，漢地庶民因受全真道之庇護，而得以保全者，無慮萬千。

《元史·丘處機傳》有云：

時（元）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

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復以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

這些都說明了全真道之所以與元庭合作，實際是救民於水火，這些作爲，真正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實際的體現。

大陸在開放政策實行之前，因爲政策的錯誤，乃至民不聊生。民

生是老百姓最主要的問題，肚子吃不飽，便一切都無法說服老百姓。因此當時的學術界，既在窮即是美的意識形態下，不能談民生問題，便轉而以民族問題，作為民心團結的指標，以民族主義談歷史，自然以簡單的「漢賊不兩立」的兩分法，作為評定歷史人物的標準，自然而然的，一些不公平的觀點也由此產生。批評全真道的親元如此，在近代史上，批評曾國藩的親清，也無非如此。

※ ※ ※ ※ ※

全真教教義中，跟其他道教傳統的派別，最大不同的一點，便是主張「三教合一」。王重陽生前所創，凡五個教會：「三教七寶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華會」、「三教平等會」等，便特別標榜「三教」——儒、釋、道，而且以儒為首。《重陽全真集》卷一〈孫公問三教〉：

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

悟徹便令知出入，曉明應許覺寬洪。

精神烝候誰能比，日月星辰自可同。

達理識文清淨得，晴空上面觀虛空。

中國的儒學，自先秦以後，就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其中派別之多，宛如百千小河，全真道所取的儒學，到底是哪一派呢？現在也以元初全真道士李道純的一首詞作，以見端倪。李道純生卒年不詳，約為元世祖時人，李為道教南宗嫡系，元併江南後，南宗道士多併入全真教，李道純為當時南北二宗合流之先導，著有《全真集玄秘要》，其《中和集》中又有〈全真活法〉，是當時的全真大家。《中和集》卷五，有〈贈鄧一蟾〉一首：

禪宗理學與全真，教立三門接後人。

釋氏蘊空須見性，儒流格物必存誠。

丹臺留得星星火，靈府銷鎔種種塵。

會得萬殊歸一致，熙臺內外總登春。

便直指「理學」，可見全真道所謂的儒學，便是宋代儒學家特別重視

「性命」「義理」的理學。

宋代的理學家眾多，擇其重要的來說，大約不出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諸家，現在將他們的生平，與王重陽及全真七子，排比成下列一個表，大致可以看出他們的年代：

姓 名	生 年	姓 名	生 年
邵 雍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		
周敦頤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		
張 載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		
程 顥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		
程 頤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		
		王重陽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
		孫不二	金太祖天輔三年(1119)
		馬 鈺	金太宗天會元年(1123)
		譚處端	金太宗天會元年(1123)
朱 熹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		
陸九淵	宋高宗紹興九年(1139)		
		郝大通	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
		王處一	金熙宗皇統二年(1142)
		劉處玄	金熙宗皇統七年(1147)
		丘處機	金熙宗皇統八年(1148)

從上表看來，生年在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之後的，有王重陽及其弟子孫不二、馬鈺、譚處端等共四人。而且以王重陽而言，距離上述出生較晚的二程子，相差有八十年之多，王氏出生時，二程均已去世。因此，王氏等受這些理學家的影響，在年代而論，是無容置疑的。其次，且看看這些理學家的思想：

邵雍所著《皇極經世》中之〈觀物內篇〉(〈觀物外篇〉)則為其學

生所記述）有「先天八卦方位圖」，其中所論跟道教的淵源極深。朱熹的語錄《朱子語類》曾說：

邵子發明先天圖，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中所言是也。

所謂希夷，是陳搏的賜號，陳搏是五代北宋間一個有名的道士，屬鍾呂內丹一派，陳氏字圖南，法號扶搖子，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王重陽極尊重這位祖輩，詞作中屢屢提到他的道法精微。如《重陽全真集》卷四〈望蓬萊〉：

回首處，便要識希夷。

《重陽全真集》卷十三〈浣溪沙〉：

希夷微妙在坤乾。

邵雍的哲學思想，既有道家的淵源，可說是一個標準以儒近道的範例，王重陽受這樣思想的啓發，終至以儒入道，可說是最自然不過的事。

其次再談周敦頤，周氏是二程子的老師，他著有《通書》、《太極圖說》等。《通書》也稱《易通》，是據《易傳》跟《中庸》來解《易》，起於論「誠」，終於「蒙」、「艮」二卦，全書共有四十章，其〈聖蘊第四〉有云：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聖學第二十〉云：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幾乎！

周氏主張無欲虛靜，全真道主要的教義，正在乎此，可見兩者關係之深。周氏又有《太極圖說》，主張無極而太極，明顯雜有道家的思想，宋·朱震《漢上易傳》中說：

陳搏以太極圖授種放，放授穆修，修授周子（指周敦頤）。於此也可知周敦頤跟道士陳搏，也是關係很深的。以邵、周二人之論，早期的理學家，基本上便是溶合儒、道兩家的理論，因而全真道的教義，與此契合，兩者都主張無欲、清寂、存誠、返真。

最後提到張載、程顥、程頤等三位北宋的大理學家，張氏的《張子全書》中〈正蒙誠明篇〉有這些言論：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程顥、程頤昆仲，都是當時理學大家，後人將程顥的《語錄》、《明道文集》，和程頤的《語錄》、《經說》、《易傳》，合編為《河南程氏遺書》。此外二氏的事跡，也詳見於《宋史·道學傳》及《宋元學案》中的〈明道學案〉（程顥）和〈伊川學案〉。

明道最主要的思想，乃是把天和人視為一本：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明道學案〉引〈語錄〉）。

又說：

嘗喻以心知天，猶若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
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到長安，更不可
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
認取，更不可外求。（《遺書》卷二上）

以此而論，明道認為「道」即「理」，「道」是超越時空形而上的，「理」則落實在萬物中，也可說是必然不變的。因此，他體悟出來，所謂「天道」，即是「天理」。他說：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遺書》卷十四）

而對於天理，卻是他自己體悟出來：

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外書》卷十二）

他又主張「格物窮理」，而「窮理」又與盡性知命相連：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若窮得了理，即性命亦可了。（《遺書》卷二上）

程顥這種作人的修爲，直接影響全真道的修行。全真道強調內心清淨，養性守氣，很多學者認爲乃是受了禪宗的影響，但個人卻認爲全真道的理論基礎，實在於理學，而非禪學。試看丘處機西行至大雪山行宮覲見成吉思汗時，成吉思汗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對曰：「有養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明示肉體是不能不死的。等到成吉思汗問起爲治之方，丘處機即以敬天愛民爲答。丘氏這樣的回答，也即是天人一本另外一種的表達。

至於程頤，這方面的主張，跟程顥是相同的。程頤認爲「理」與「道」無非是一事：

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遺書》卷二十一下）

只是道是萬物的本源，是形而上，所以在討論萬物時，就必須以理作爲範疇：

凡眼前皆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遺書》卷十九）

因爲程頤把這一種學術思想的中心，歸之於「理」，也可知「理學」得名的由來。而全真道修行的基礎，得之於二程氏者獨多，也就由此可見了。

全真道自丘處機覲見成吉思汗開始（1222），在國內大盛，其聲勢壓倒其他任何宗教。元憲宗八年（1258），終於盛極而衰，其原因是當時產生了一次佛道的論爭，全真道既標榜儒、釋、道三教合一，又何以會跟佛教論爭，我個人認爲宗教的排他性固是一個原因，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別，尚有論爭，何況異教？但另一個原因應該是全真道的基本思想，接近理學，遠勝於佛學所致。佛道論爭，應該是全真道近儒最好的一個註腳。

※ ※ ※ ※ ※